

中国古代散文的当代传播困境探因

阚文文, 阴志科

(山东农业大学 中文系, 山东 泰安 271018)

摘要: 作为书籍文化的典型代表, 中国古代散文在当代面临着较为尴尬的传播困境, 其原因在于: 狭窄单一的传播渠道导致古代散文至今只能在学术圈和学校教育中传播; 大众消费主义带来的媒介化、功利化、跨边界特点导致古代散文的价值无法体现为社会“受欢迎程度”; 古代散文强调思辨、反对直观, 其远离现实的传播内容与传播载体致使自身被媒介社会边缘化; 古代散文自相矛盾的传播功能和目的弱化了自身的传播效果。

关键词: 古代散文; 传播困境; 大众媒介

中图分类号: I206.2, G206.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1)05-0073-04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dilemma of classical Chinese proeses

KAN Wen-wen, YIN Zhi-k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hand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aian 271018,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the reasons making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study communication embarrassed: narrow channel and single media form make its works communicated only within scholar and school. Post-modernism and its popularity, media, interest, and trans-border characters make classical Chinese prose's value far away from welcome. Presenting books culture,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stress the speculation, so was and is marginalized. Most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proeses were not for literature, and its concept's slipping had reduced its communicating effect outward.

Key words: classical Chinese prose; communication dilemma; mass medium

众所周知, 文学不得不“诉诸媒介, 才能进入发行、流通、消费和接受的过程”, “媒介的选择总是关涉着文学文本的意义及其修辞效果”,^[1]但文学作品与其传播过程在当代已不仅仅是内容表达与形式选择的单纯关系, 媒介传播不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描述、表达、传递工具, 借用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的话语方式, 如果“文学即人学”, 那么“文学即传播”, 传播形式及传播渠道作为一种生态环境正在决定着文学的创作与接受。正如希利斯·米勒所预测的: “数字化的东西将会多方面和以人们无法预测的方式改变文学和文学研究”, “它将会转变和已经在转变文学或文学性的概念, 它正在

逼杀文学, 给它以一种新的存在形态”^①, 这是当代包括散文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传播必须面对的语境问题。在当前古代小说、诗歌、戏曲通过大众媒介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其现代形式的转换之后, 中国古代散文由于其利用精英化的传统媒介(如书籍)去实现伦理教化的独具特点, 在当代却难以利用大众化的电子媒介(如电视、互联网)去满足已经习惯于媒介化信息的普通受众。而在学术界, 从传播学的角度探讨古代文学目前已成为一种能够结合文献与文化、历史与现实的研究策略。王兆鹏先生认为, 古代文学研究应从传播主体、传播环境、传播方式、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六个方面进行考察。^[2]正是在这种思路的启发下, 笔者拟从以上这些层面来综合分析中国古代散文在当代所处传播困境的深层原因。

收稿日期: 2011-09-14

作者简介: 阚文文(1979—), 女, 山东济宁人,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 山东农业大学讲师, 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传播学、文艺理论研究。

一、狭窄单一的传播渠道

古代散文作品传播在当代不免要遭遇古今文字、词汇、句式方面的巨大差异,读者往往需要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足够的阅读时间,但由于传播环境的彻底转变,古代散文在先秦时期便已建立起来的文体优势发展到今,距离日常生活越来越远,主动型读者越来越少。

先秦之时的文史哲不分家,直到文学初具独立形态的魏晋南北朝之前,以散文和诗歌为代表的文学艺术形式都通过宫廷和学校两个系统进行组织传播,后来又有了文人清谈、文会^②以及其他个人传播形式,一方面散文尤其是公文的主要应用领域在宫廷,另一方面个人抒怀的散文作品以文人、士大夫之间的酬唱交流为主,因此散文在学校教育之外无法到达基层民众。典谟训诰、表章奏疏等公文主要通过宫廷组织传播来完成,抒情性的作品比如《兰亭序》则是通过文人集会的个人传播来实现。而在文艺作品具备商品化特征的宋元之后,小说、戏曲主要通过图书、剧场来实现大众传播,只有散文依然脱离不了宫廷和学校这两个基本的传播渠道。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当代,古代散文仍局限在知识分子学术圈和学校教育两个渠道中传播。

较之小说、诗歌甚至戏曲,古代散文的口头传播在当世之时都难于实现,只能运用有形的书面传播,书面传播又仅限于公文传递、私人书信、学校教材、文集汇总^③,因此古代散文大众化的程度较低。艺术形式都需要到达观众或读者,艺术要靠时代和民众来检验,古代散文历经千百年的积淀却仍未得到当代读者的足够重视,原因决不在于作品本身,而在于未能充分利用大众传媒的传播威力影响大众——小说、诗歌、戏曲在古代利用了印刷品、题壁、剧场,如今则利用了广播、电视、电影、网络等新兴媒介形式,只有古代散文局限在手抄或书籍印刷的领域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原因——新媒体便于读者卷入其中,更方便众多拥有类似兴趣的读者群进行直观的体验交流。在当代,古代小说、诗歌、戏曲可以充分利用的媒介形式至少包括歌曲MV、电视诗歌、电视剧、电影、网络与多媒体、甚至手机短信、彩信,唯有古代散文无法

有效运用之:中央电视台早在2004年《电视诗歌散文》栏目推出《古代散文名篇》系列,只运行了很短的数月时间便停播,原因在于古代散文与现代媒介形式难以交融,缺少形象思维和想象力发挥的空间,严重脱离当代日常生活。

二、大众消费主义的排挤

当代社会在许多方面具备了后现代理论家们所宣称的“后现代”消费主义特征: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瓶颈得以消除,消费反过来制约着生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生产行为,消费社会媒介化、跨边界、功利化的几个特点在古代散文作品传播层面上的排挤效应已经得到明确显现。^[3]

媒介社会、媒体文化是后现代社会的标志性符号,如果说“媒体文化的视觉和口头形式正在排挤书籍文化”,^[4]那么,古代散文显然是书籍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强调思辨、反对直观、歧视大众、难于口传,被当代媒介社会边缘化便不足为奇。以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为例,在创作完成之后便被广为传诵,一方面是作者的政治与文化地位较高,另一方面却缘于当时市场经济尤其是大众传播(印刷业)的推波助澜。《醉翁亭记》的传播背景和境遇在众多古代散文的大众传播中只是一个孤例,无疑并不具备普遍性,而且在当代媒体文化的传播中也并未见到明显的优势。在当代大众消费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古代诗歌、戏曲、小说可以在功利化的经济、政治利益推动下,充分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力转换成为现代意义上的诗歌(如流行歌曲歌词)、戏曲(如电影电视剧本)、小说甚至其他媒介文化形式,古代散文却仍局限在由文言至白话的浅层次“外观”转换上。

任何文学艺术形式都在互相吸收对方的创作手法,克里斯蒂瓦提出“文本间性”概念,意味着文类之间的模糊与跨边界。虽说“散文可以吸收诗歌的韵律,可以采用小说中某些幻想和夸张手法,甚至可以有戏剧式的对话和动作表情描写。散文还可以灵活使用书信体、日记体、公牍体、哀祭体、论说体、戏谑体等体裁”,^[5]但古代散文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个跨边界的优势,在借鉴其他文类方面的跨边界工作自古以来也所做不多。根据托多洛夫的

定义,只有通过“历史性文类”(事实观察的作品实践)对“理论性文类”(理论推导的文学规范)的不断冲击才能导致文类本身的进步,^[6]古代散文不但不像古代小说、诗歌、戏曲那样不断推陈出新,相反,战国以降的历代文人在创作散文之时均以复古、拟古、师古为目标,作品从未试图冲击甚至瓦解过既定的理论规范,这种反历史、反世俗的精英主义逆行思维造成了古代散文自身发展的停滞。

诚然,“古代散文的发展过程不同于古代的诗歌、小说,古代诗歌、小说的形式、技巧是经历过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之后,才逐渐达到顶峰的,而古代散文没有经过技巧的发展过程,在战国时期随着语言的发展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潮”。^[7]这是古代散文“回顾式”发展反大众、反消费的历史原因,但在当代,消费主义意味着大众化、媒介化、跨边界,古代散文却强调小众化、精英化、孤立化,所以古代散文在古代都没能完成当世之时的“现”代转换,在当代完成转换更是难上加难。

三、远离现实的传播内容与载体

古代散文的内容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实效性,无法抛弃作者与时代的大背景,离开作者和当时的历史便无法了解作品的价值,这是古代散文的最大特色。刘熙载《文概》将作家的思想道德性格气质与作品的内容与价值联系起来,已经说明对散文的研究难以独立完成,非常依赖于作家生平、社会风貌方面的历史考证工作。但不管作者是谁,小说、戏曲、诗歌都可以独立完成审美过程,诗歌、小说、戏曲在现当代的变体之中有共时性的结构,比如意象、情节、人物,但散文只有历时性的远离现实的语言,离开了时代和作家背景,散文被利用的元素恐怕只剩下修辞^④、典故和伦理教化,可这些东西在其他艺术形式里同样找得到,散文作为一种依附于历史而游离于现实的文学,与其他艺术相较并不具备明显优势。

在当代,罗兰·巴特之所以说作者已死,是因为读者起着“作者”的功能,读者可以再创作,读者决定着作品的受欢迎程度,读者的消费决定着作者的生产,文化产品的消费决定着文化产品的生产。古代散文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没能像白诗柳词

那样被读者大众广为消费,诗词、小说、戏曲的传播领域绝不仅限于宫廷和学校,当代有人参考、改编古体诗词创作流行音乐歌词,有人参考并改编古代小说和古代戏曲创作影视剧本——可古代散文不但缺少读者,还缺少读者的再创作,原因是随着时代变迁,古代散文所依托的语言、语法、文字、韵律规范等传播载体早已变化甚至消失,古代散文在当代一定程度上成了小众化的知识分子游戏,大多数普通读者并没有消费需求,而“20世纪初人们写的文章与公元前五六世纪的《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在用词、造句、语法等方面几乎没有区别。这种文言文至迟在南北朝时期已经脱离口语,大别于当时所谓‘通俗文’,以及唐宋语录、宋元白话。”^[5]可见古代散文在传播载体方面与历代世俗社会的巨大隔阂导致大众无法对其持续保持热情,于是在消费主义至上的现代社会中,古代散文的价值自然不能体现为“受欢迎程度”和“被接受程度”,这是小众化的古代散文面临的第一难题。

四、自相矛盾的传播功能和目的

古代散文自身存在功能与目的上的双重自反性导致自古以来研究理念冲突不断。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将文章分为辞命、叙事、议论、诗赋四大类,虽然饱受批评,但相比较动辄分类几十种甚至百余种的散文文体研究而言,这已经是古代散文研究方面相当有见地的,敢于简化、提升、抽象的“理论式”思辨。由于辞命和议论大致相当于典谟训诰、表章奏疏等应用文,主要强调逻辑性和应用性,其作用更接近于在应用的基础上表现政治抱负、道德理想和文艺修养,所以大多数古代散文并不是“文学之文”,这种“应用”和“艺术”在功能上的自反性影响了古代散文的广泛传播:重应用便必须弱化艺术性,重艺术则又弱化了应用效果。

同时,小说出版单行本、戏曲现场演出、诗歌结集发行都是有效的大众传播形式,生产即是为了消费,但以应用为主要目的的中国古代散文或者过于注重私人情感(书信),或者过于注重政治道德(表章),其作品的生产目的显然不同于诗歌、小说、戏曲。这些作为散文主体的应用文既要向上传播(上司与帝王),也要向下传播(同僚与士林),向上传播希望得到

积极的信息反馈,向下传播却不希望得到消极的信息反馈,而在实际中则往往是反对消极反馈的同时把积极反馈也予以堵塞,谢绝论争、反对商榷,因此这种蕴含在同一篇文章中的自相矛盾的传播目的自反性既影响了作者表达,也让读者无所适从。

进一步看,小说、戏剧本身来自下层,天生具备市场属性。而诗词来自知识分子阶层或统治阶级,散文与诗词来源很类似,然而诗词韵律铿锵,易于入乐传诵;散文却只适合案头阅读,承载了历史、哲学、政治等需要思辨和论证的主题,因此一贯追求复古的古代散文本质上是一种思辨哲学,有韵无韵并不影响其论辩的逻辑性。但是,身处官僚体系中的知识分子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又必须让自己的态度、观点、思想尽可能得到多数人的赞同和更高级官僚的认可,然而这要求他所创作的散文是普及性的、通俗易懂的,所以论证过程的理性和传播过程的感性二者之间的自相矛盾严重束缚了古代散文的作者和读者。

五、结语

必须承认,古代散文作品当中一般会在深层结构下隐藏着一个明确的、必须被表达的本质主题,政论文、八股文甚至大赋、骈文无不如此,散文是表达某种独立本质的附属物。尽管艺术并不完全为了游戏而游戏,艺术总归有目的,但绝大多数古代散文追求教化、弘道复古的目的势必影响它在民间的传播效果,韩柳、唐宋、桐城都以精英主义的姿势指点江山,反对任何“反对意见”,单方面的说教和灌输势必难以得到积极的传播反馈。在当代,说教式的传播早已起不到任何积极意义,只有平等对话、多方讨论的传播才能得到受众的积极回应,文学不是政治和思想运动的工具,散文需要为社会公民服务,为普通大众服务,散文易于贴近日常生

活,表现大众文化,大历史散文、小女人散文、美文在博客(Blog)普及的今天又找到了舞台,每个人都有能力、有机会在互联网上通过千姿百态的散文表达自己的观点,而古代散文在行文技巧、修辞方法、语言风格方面的丰富经验必将为文学的大众传播起到莫大的推动作用。

注释:

- ① Hillis Miller, *Black Ho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3. 转引自肖锦龙:《米勒视野中的传播媒介和文学》,载《文艺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
- ② 参见唐翼明:《魏晋南北朝时代学术与文学传播的新方式》,载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编《文学与传播的关系》,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版,第3页。
- ③ 参见王兆鹏:《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思考》,载《文学遗产》,2006年第2期。文中将书集传播进行了分类,包括别集、总集、诗话(含文话、词话、赋话)、笔记、小说、戏曲和类书等等。
- ④ 修辞学在西方传统中为说服术、论辩术,并非文学范畴。

参考文献:

- [1] 王一川. 论媒介在文学中的作用[J]. 广东社会科学, 2003(3): 22-27.
- [2] 王兆鹏.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六个层面[J]. 江汉论坛, 2006(5): 109-113.
- [3] 道格拉斯·凯尔纳. 波德里亚: 一个批判性读本[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200.
- [4] 道格拉斯·凯尔纳. 媒体文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9.
- [5] 谭家健. 中国古代散文若干焦点之探讨[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2004(3): 371-379.
- [6] 陈军. 20世纪西方文类研究概述[J]. 江海学刊, 2008(6): 186-190.
- [7] 宁俊红. 20世纪古代散文批评范式的演变与反思[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3(6): 31-37.

责任编辑: 曾凡盛